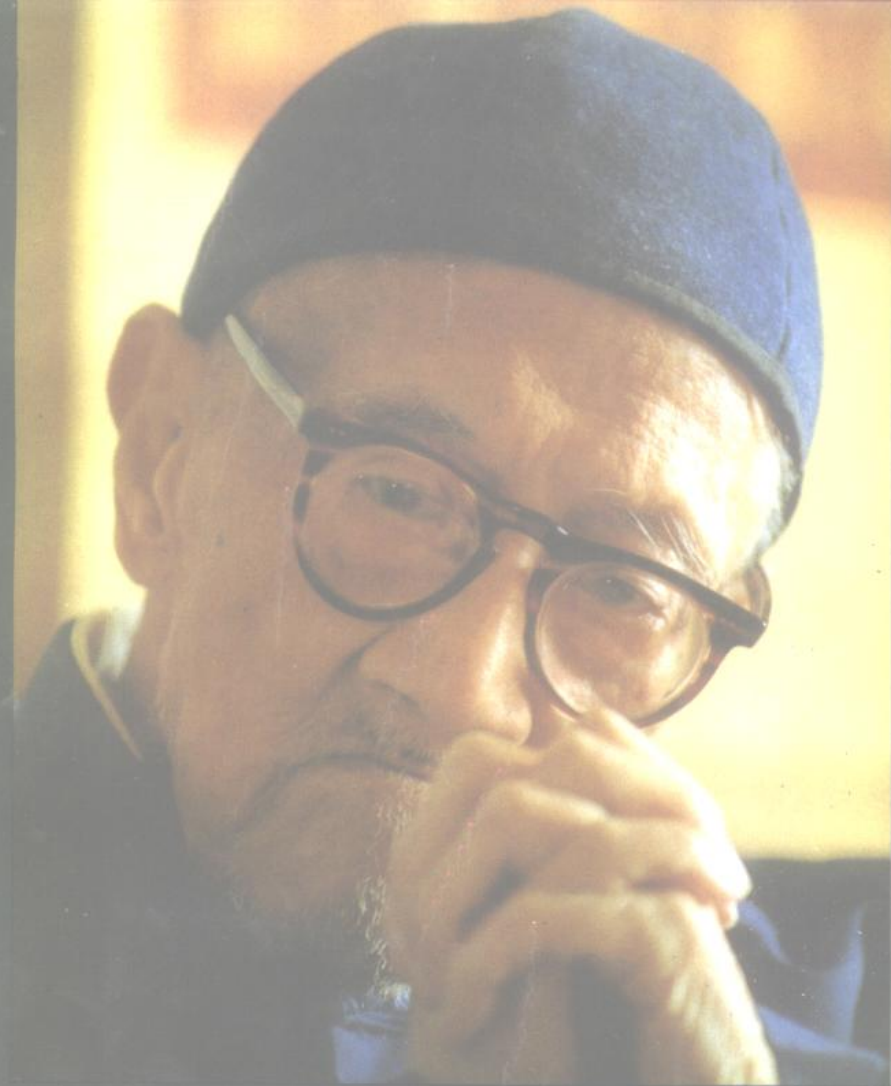




憶往談舊錄

梁波洪

憶
往
談
舊
錄

梁漱溟自題

责任编辑：张燕妮

忆 往 谈 旧 录

梁漱溟著

*

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北京太平桥大街23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通县燕山印刷厂印刷

劲松装订厂装订

*

1987年12月第一版·1991年10月第二次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8.25 插页：2 字数：210千

印数：11,000—16,000册

ISBN7—5034—0003—X/K·0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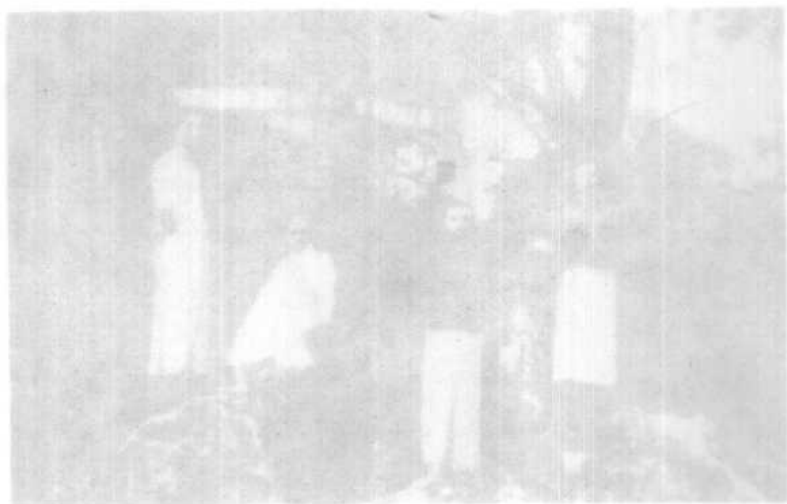
定价：4.40元

沈氏 兩小刺金葉合
一〇四 平氏照



梁漱溟先生近照

傳(古一)雷開張(古一)合張
山公園(古一)李大同(古一)張中
一其一其平寺中央公園(古一)中



一九〇四年与祖母、父母、
长兄、两小妹全家合影。



一九一六年任司法部秘书时与
沈钧儒（右二）、何基鸿（右三）、
柴春霖（右四）合影。



一九一九年在中央公园（今中
山公园）与李大钊（左二）、张申
府（右一）、雷国能（左一）合影。





三十年代初乡村工作同人合影

前排左起：于树德、晏阳初、高践四、陈筑山、严敬斋、魏朗斋、章元善、梁漱溟。

后排左起：张鸿钧、瞿菊农、孙则让、李景汉、梁仲华、杨开道、许任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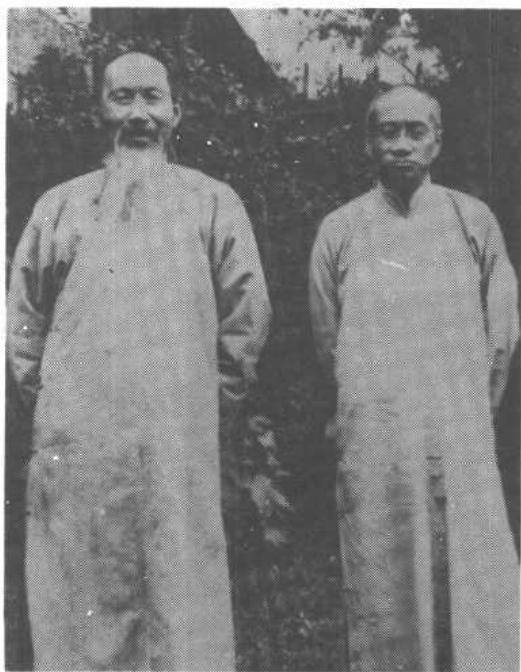
一九三九年二月自重庆赴河南、安徽、江苏、山东、河北等敌后巡视，九月返回洛阳时留影。
前排左起第三人王靖波和第五人黄良庸为赴敌后同行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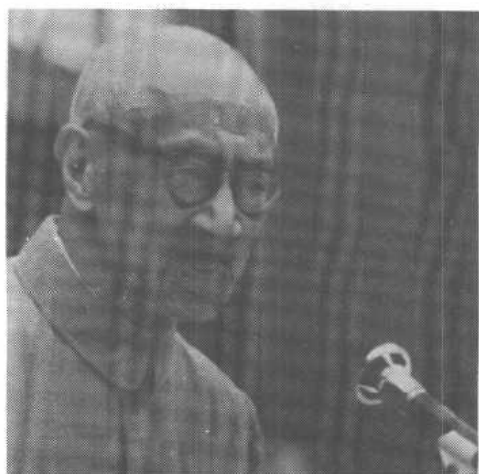
1942年香港脱险居
住于桂林时留影



1948 年在重庆北碚撰写《中国文化要义》时留影



1950 年与张澜先生合影



1985 年 6 月在孔子研究所成立大会上讲话
(张炳礼摄影)

编辑说明

梁漱溟先生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海内外享有盛名的学者。本书收集了梁漱溟的回忆文章20余篇，记述了他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前后、抗日战争、国共和谈等时期的学术、民主活动以及对一些重要事件、亲朋故旧的回忆、追念。

本书所收文章一部分曾在解放前后的报刊书籍上发表过，也有许多文章是第一次同读者见面。由于这些文章是梁漱溟先生在不同时期写就，而且独立成章，因此个别内容难免重复。为了从不同的角度反映梁漱溟先生的经历和重要活动，并保持文章的完整性和连贯性，编者对此一般依原稿所记予以刊载，以供读者研究参考。

编 者

0754/03

目 录

我的自学小史	(1)
自述早年思想之再转再变	(29)
有关民国初年政史的见闻纪实	(37)
记彭翼仲先生	(49)
纪念梁任公先生	(74)
五四运动前后的北京大学	(81)
纪念蔡元培先生	(88)
回忆李大钊先生	(95)
追记广州往事	(99)
记十八年秋季太原之行	(110)
回忆我从事的乡村建设运动	(116)
我所了解的蒋介石	(125)
七七事变前后的韩复榘	(134)
蒋百里轶事数则	(146)
参加国防最高会议参议会	(151)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发起成立之经过略记	(157)
我参加国共和谈的经过	(167)
国共两党和谈中的孙科	(217)
回忆参加调查国民党暗杀李闻案	(222)

过去和谈中我负疚之一事	(228)
过去内战的责任在谁?	(241)
梁漱溟年谱简编	(246)

我的自学小史

我生在这样一个家庭——我的父亲——一个瘠弱而又呆笨的孩子——经过两度家塾、四个小学——从课外读物说到我的一位父执——自学的根本——五年半的中学——中学时期之自学——自学资料及当年师友——初入社会——激进于社会主义——出世思想与学佛学医——父亲对我信任且放任——当年倾慕的几个人物——回到世间来

1942年我在桂林时，应《自学》月刊编者之约，撰写《我的自学小史》一稿，未写完。1974年抽暇就原拟纲目简略补写完成。我的一生是一个自学的实例，若将我自幼修学，以至在某些学问上“无师自通”的经过，叙述出来给青年朋友，未始无益，因此现在把它拿出来发表。个别文字作了修改，内容则一仍其旧。

学问必须经自己求得来者，方才切实有受用。反之，未曾自求者就不切实，就不会有受用。俗语有“学来的曲儿唱不得”一句话，便是说：随着师傅一板一眼地模仿着唱，是不中听的。必须将所唱曲调吸收融会在自己生命中，而后自由自在地唱出来，才中听。学问和艺术是一理；知识技能未到融于自己生命而打成一片的地步，知非真知，能非真能。真不真，全看是不是自己求得的。一分自求，一分真得；十分自求，十分真得。“自学”这话并非为少数未得师承的人而说；一切有师傅教导的人，亦都非自学不可，不过比较地说，没有师承者好象“自学”意味更多就是了。

我愿指出：我虽自幼不断地学习以至于今，然却不着重在书

册上，而宁在我所处时代环境一切见闻。我又不是为学问而学问者，而大抵为了解决生活中亲切实际的问题而求知。因此在我的自学小史上，正映出了八十多年来的社会变动、时代问题。倘若以我的自述为中心线索，而写出中国近代的变迁，可能是很生动亲切的一部好史料。现在当然不是这样写的，但仍然可以让青年朋友得知许多过去事实，而瞭然于今天他所处社会的一些背景。

我生在这样一个家庭

距今88年前，我生于北京。那是公元1893年（清光绪十九年癸巳），亦就是甲午中日大战前一年。甲午之战是中国近百年史中一个关键，所有种种剧烈变动皆由此起来。而我的大半生，恰好是从那一次中日大战到这一次中日大战。

我家原是桂林城内人。但从祖父离开桂林，父亲和我们一辈便都生长在北京了。母亲亦是生在北方的，而外祖父张家则是云南大理人，从外祖父离开云南，没有回去。祖母又是贵州毕节刘家的。在中国说，南方人和北方人，不论气质上或习俗上都颇有些不同的。因此，由云南省人来看我们，则每当成我们是北方人，而在当地北方人看我们，又以为是来自南方的了。我一家人，实兼有南北两种气质，而富于一种中间性。

从种族血统上说，我们本是元朝宗室。中间经过明清两代五百余年，不但旁人早不晓得我们是蒙古族，即自家不由谱系上查明亦不晓得了。在几百年和汉族婚姻之后的我们，融合不同的两种血，似亦具一中间性。

从社会阶级成分上说，曾祖、祖父、父亲三代都是从前所谓举人或进士出身而做官的。外祖父亦是进士而做官的。祖母、母亲都读过不少书，能为诗文。这是所谓“书香人家”或“仕宦之家”。但曾祖父做外官（对京官而言）卸任，无钱而有债。祖父来还债，债未清而身故，那时我父亲只七八岁，靠着祖母开蒙馆教几个小学生度日，真是寒苦之极。父稍长到19岁，便在“义学”

中教书，依然过着寒苦生活。世宦习气于此打落干净；而市井琐碎，民间疾苦，倒亲身尝历不少。40岁方入仕途，又总未得意，景况没有舒展过。父母生我们兄妹四人。我有一个大哥，两个妹妹。大哥留学日本明治大学商科毕业。两妹亦于清朝最末一年毕业于京师女子师范学堂。我们的教育费，常常是变卖母亲妆奁而支付的。

象这样一个多方面荟萃交融的家庭，住居生活于全国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自无偏僻困陋之患。又遭逢这样一个变动剧烈的时代，见闻既多，是很便于自学的。

我的父亲

促成我之自学的，完全是我的父亲。所以必要叙明我父亲之为人，和他对我的教育。

吾父是一秉性笃实的人，而不是一天资高明的人。他做学问没有过人的才思，他做事情更不以才略见长。他与我母亲一样天生地忠厚，只他用心周匝细密，又磨练于寒苦生活之中，好象较比能干许多。他心里相当精明，但很少见之于行事。他最不可及处，是意趣超俗，不肯随俗流转，而有一腔热肠；一身侠骨。

因其非天资高明的人，所以思想不超脱，因其秉性笃实而用心精细，所以遇事认真，因为有豪侠气，所以行为只是端正，而并不拘谨。他最看重事功，而不忽视学问，前人所说“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匹妇不被其泽”的话，正好点出我父亲一副心肠。我最初의思想和做人，受父亲影响，亦就是这么一路（尚侠、认真、不超脱）。

父亲对我完全是宽放的。小时候，只记得大哥挨过打，这亦是很少的事。我则在整个记忆中，一次也没有过。但我似乎并不是不“该打”的孩子，我是既呆笨，又执拗的。他亦是很少正言厉色地教训过我们，我受父亲影响，并不是受了许多教训，而毋宁说是受一些暗示。我在父亲面前，完全不感到一种精神上的压

迫。他从未以端凝严肃的神气对儿童或少年人。我很早入学堂，所以亦没有从父亲受读。

10岁前后（七八岁至十二三岁）所受父亲的教育，大多是下列三项：一是讲戏；父亲平日喜欢看戏，即以戏中故事情节讲给儿女听。一是携同出街，购买日用品，或办一些零碎事，其意盖在练习经理事物，懂得社会人情。一是关于卫生或其他许多嘱咐，总要儿童知道如何照料自己身体。此类之嘱咐或指点极其多，并且随时地不放松。

还记得9岁时，有一次我自己积蓄的一小串钱（那时所用铜钱有小孔，例以麻线贯串之）忽然不见。各处寻问，并向人吵闹，终不可得。隔一天，父亲于庭前桃树枝上发见之，心知是我自家遗忘，并不责斥，亦不喊我来看。他却在纸条上写了一段文字，大略说：一小儿在桃树下玩耍，偶将一小串钱挂于树枝而忘之，到处向人寻问，吵闹不休。次日其父打扫庭院，见钱悬树上，乃指示之。小儿始自知其糊涂云云。写后交与我看，亦不作声，我看了，马上省悟，跑去一探即得，不禁自怀惭意。即此事亦见先父所给我教育之一斑。

到14岁以后，我胸中渐渐自有思想见解，或发于言论，或见之行事。先父认为好的，便明示或暗示鼓励。他不同意的，让我晓得他不同意而止，却从不干涉。十七八九岁时，有些关系颇大之事，他仍然不加干涉，而听我去。就在他不干涉之中，成就了我的自学。那些事例，待到后面即可叙述到。

一个孱弱而又呆笨的孩子

我自幼孱瘦多病，气力微弱，未到天寒，手足已然不温。亲长皆觉得此儿怕不会长命的。每患头晕目眩，一时天旋地转，坐立不稳，必须安卧始得。七八岁后，虽亦跳跃玩耍，总不如人家活泼勇健。在小学里读书，一次盘杠子，跌下来，用药方才复苏。以后更不敢轻试。在中学时，常常看着同学打球踢球，而不

能参加，人家打罢踢罢了，我方敢一个人来试一试，又因为爱用思想，神情颜色皆不象一个少年，同学给我一个外号“小老哥”。广东人呼小孩原如此的，但北京人说来，则是嘲笑话了。

却不料后来年纪长大，我倒很少生病。30岁以后，愈见坚实，寒暖饥饱，不以为意。素食（不食任何动物）至今达70年，亦没有什么营养不足问题。每闻朋友同济或患遗精，或患痔血，或患胃病，或脚气病；在我一切都没有，若以体质精力相较，反而为朋辈所不及。久别之友，十几年以至二十几年不相见者，每都说我现在还同以前一个样子，不见改变。因而人多称赞我有修养。其实，我亦不知道我有什么修养，不过平生嗜欲最淡，一切无所好。同时，在生活习惯上，比较旁人多自知注意一些罢了。

小时候，我不但孱弱，并且很呆笨的。约摸6岁了，自己还不会穿裤子。因裤子上有带条，要从背后系到前面来，打一个结扣，而我不会。一次早起，母亲隔屋喊我，为何还不起床？我大声气愤地说：“妹妹不给我穿裤子呀！”招引得家里人都笑了，原来天天要妹妹替我打这结扣才行。

10岁前后，在小学里的课业成绩，比一些同学较差。虽不是极劣，总是中等以下。到14岁入学，我的智力乃见发达，课业成绩，间有在前三名者，大体说来，我只是平常资质，没有过人之才，在学校时，不算特别勤学；出学校后，亦未用过苦功。只平素心理上，自己总有对自己的一种要求，不肯让一天光阴随便马虎过去。

经过两度家塾、四个小学

我于6岁开始读书，是经一位孟老师在家里教的。那时课儿童，入手多是《三字经》、《百家姓》，取其容易上口成诵。接着就要读四书五经了。我在《三字经》之后，即读《地球韵言》，而没有读四书。《地球韵言》一书，现在恐已无处可寻得。内容多是一些欧罗巴、亚细亚、太平洋、大西洋之类，作于何人，我

亦记不得了。

说起来好似一件奇特事，就是我对四书五经至今没有诵读过，只看过而已。这在同我一般年纪的人，是很少有的。不读四书，而读《地球韵言》，当然是出于我父亲的意思。他是距今85年前，不主张儿童读经的人。这在当时自是一破例的事。为何能如此呢？大约由于父亲平素关心国家大局，而中国当那些年间恰是外侮日逼，父亲心里很激动。因此，他很早倾向维新变法。在他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话：“……却有一种为清流所鄙，正人所斥，洋务西学新出各书，断不可以不看。盖天下无久而不变之局，我只力求实事，不能避人讥讪也。”（光绪十年四月初六日记“论读书次第缓急”）

到了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就是我开蒙读书这一年，正赶上光绪帝变法维新。停科举，废八股，皆他所极端赞成，不必读四书，似基于此。只惜当时北京尚无学校可入。而《地球韵言》则是便于儿童上口成诵，四字一句的韵文，其中略说世界大势，就认为很合用了。

次年，我7岁，北京有第一个“洋学堂”（当时市井人都如此称呼）出现，父亲便命我入学。这是一位福建陈（铎）先生创办的，名曰“中西小学堂”。现在看来，这名称似乎好笑。大约当时系因其既念中文，又念英文之故。可惜我从那幼小时便习英文，而到现在亦没学得好。

8岁这一年，英文念不成了，这年闹“义和团”——后来被称为“拳匪”——专杀信“洋教”（基督教）或念洋书之人。我们只好将《英文初阶》、《英文进阶》（当时课本）一齐烧毁。后来因激起欧美日本八国联军入北京，清帝避走陕西，历史上称为“庚子之变”。

庚子变后，新势力又抬头，学堂复兴。9岁，我入“南横街公立小学堂”读书。十岁，改入“蒙养学堂”，读到11岁。12岁、13岁，又改在家里读书，是联合几家亲戚的儿童，请一位奉

天刘（讷）先生教的。13岁下半年到14岁上半年，又进入“江苏小学堂”，这是江苏旅居北京同乡会所办的。

因此，我在小学时代前后经过两度家塾、四个小学。这种求学不得安稳顺序前进，是与当时社会之不安、学制之无定有关系的。

从课外读物说到我的一位父执

我的自学，最得力于杂志报纸。许多专门书或重要典籍之阅读，常是以杂志报纸先引起兴趣和注意，然后方觅它来读的。即如中国的经书以至佛典，亦都是如此。他如社会科学各门的书，更不待言。因为我所受学校教育，以上面说的小学及后面说的中学而止，而这些书典都是课程里没有的。同时，我又从来不勉强自己去求学问，作学问家；所以非到引起兴趣和注意，我不去读它的。我之好学，是到真“好”才去“学”的。而对某方面学问之兴趣和注意，总是先借杂志报纸引起来。

我的自学，作始于小学时代。奇怪的是，在那样新文化初初开荒时候，已有人为我准备了很好的课外读物。这是一种《启蒙画报》和一种《京话日报》，创办人是我的一位父执，而且是对我关系深切的一位父执。他的事必须说一说。

他是彭翼仲（诒孙）先生，苏州人而长大在北京。祖上状元宰相，为苏州世家巨族。他为人豪侠勇敢，其慷爽尤可爱。论体魄，论精神，俱不似苏州人，却能说苏州话。他是我的谱叔，因他与我父亲结为兄弟之交，而年纪少于我父，他又是我的姻丈，因我大哥是他的女婿，他的长女便是我的长嫂。他又是我的老师，因前说之“启蒙学堂”就是他主办的，我在那里从学于他。

从他的脾气为人（豪侠勇敢）和环境机缘（家住江南，邻近上海，得与外面世界相通），就使他必然成为一个爱国志士，维新先锋。距今80年前（1902年），他在当时全国首都——北京创办了第一家报纸。严格讲，他是第二家；1901年先有《顺天时报》。